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是明末清初的中西学术交流。交流是相互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传入西方，对西方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也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的宗教、哲学和古典科学^①，以及刚萌芽的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思想交锋、融合，对以后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向近代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交流的重要主体。他们出入中西，与两方学者密切来往，再加以频繁的书信报告和书籍出版，将中西思想带到了一起。

依据这一交流主体身份的转变，可以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582 - 1687 年间葡萄牙保教权控制下的交流与 1688 - 1775 年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交流。

1543 年，哥白尼（Nicolaus Kopernigk，1473 - 1543）发表《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也发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②。

① 本文此处使用的“科学”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技术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172 页。

1600-1640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逐步将实验方法、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近代科学的方法。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近代科学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的建立。因此，明清之际中西学术交流前后两个阶段的西方学术背景已发生巨大变化，传教士所受教育在内容上也有显著变化。就科学方面而言，前一阶段主要是古典科学，并将之作为神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论证神学而服务。后一阶段中已有近代科学内容。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科学可以与神学、哲学相对分离，成为独立的关于经验事实的知识体系。科学为论证上帝服务已经退居后列，而为世俗生活服务则跃居前列。本论文讨论的是前一阶段由西向东的学术传播，即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学术思想能够在中国产生影响，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融合，实现本土化。当时及后来学者称之为中西会通。“会通”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会合变通”。《易·系辞上》讲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指各种运动现象的相合与相通之处。后多用为融会贯通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道：“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因此，中西会通就是将中西方思想融会贯通。

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另一个方面则是关于自然事物经验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技术的会通，也就是广义而言的科学的会通。艺术方面虽有会通，但比较而言，分量很小。在两个大的方面，就前者而言，传教士将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传入中

国，与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展开交锋与融合；就后者而言，传教士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 - 1274，意大利人，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神哲学（托马斯主义）中用以论证上帝至大、至善、至能之自然知识及与之相关的数学、逻辑学和方法论传入中国，与传统的格致知识交流、融合古典科学本身的性质和地位决定这两个方面的传播是密切联系的，即所谓“学术传教”。在当时，天主教教义和形而上学与儒学、佛教和道教都产生了巨大冲突，但也出现了一些天主教伦理道德观念与儒学伦理道德观念的融合和交汇^①突出的会通成就则在科学方面。本文所讲“中西会通”仅就科学方面而言。

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是西方古典科学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传统格致知识相融合的过程。这是孕育于天主教文化与儒教文化两种异质文化下的同类知识的融合。明末清初学者极力提倡并大力推进中西会通中西会通也因此成为中国科学知识 with 科学观念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成为明清以来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科学史、哲学史、学

① 沈定平曾分析王学和泰州学派与西学的会通之处：其一，反对程朱理学之“太极”观念；其二，提倡平等、兼爱；其三，重友伦。他还分析了东林学派与西学之会通：其一，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及“圣洁”的生活方式；其三：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即科学知识）；其三，抨击空幻的佛学及“三教合一”谬说。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第 555 - 557 页、第 569 - 575 页。

术史和文化交流史学者对该课题有很多论述。^①

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中还没有引入“科学”这个概念，当

- ① 国内外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下述四个方面：①对当时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代表性工作当数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日本山田庆儿的《耶稣会士的科学研究》、李俨的《西洋历算之输入》詹嘉玲等（C. Jami & H. Delahaye）的 *L'Europe en Chine* 等。②关于中西会通与中国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例如，李约瑟对比默顿（Robert K. Merton）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清教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各因素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中西会通的影响。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他着力讨论了儒道文化的作用，其中也论及大一统政治体制的作用。在第七卷中，他计划阐述语言与逻辑、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但是，这一研究工作现在还未完成。其他重要的研究如卜德（Derk Bodde）的 *Chinese Thought, Society: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70 年代，西方兴起“中国中心观”的汉学。学者们将中国与西方置于平等地位，进行基于详实史料的无偏见的考察和比较。这些研究力求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现中国自己的科学发展机制，并进一步解释明清之际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后，是如何本地化而被接受的。例如，席文（Nathan Sivin）在 *Wang His-Shan* 一文中试图通过对王锡阐一生的分析来阐述当时的满汉民族冲突、儒家思想、清初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风气对中西会通的影响。席文的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or Didn't It?* 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 *Chine et Christianisme*，也是此类研究。黄一农是该研究领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代表性的如：《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和《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③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重要人物及其著述和活动的专题研究，如魏特（R. Attwater）的《汤若望传》（Adam Schall: A Jesuit at the Court of China 1652 - 1666）、裴化行（R. P. Henri Bernard）的《利玛窦神父传》（Le Pere Marthieu Ricci Et La）、史景迁（Jonathon Spence）的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和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 - 1960*；又如，N. Glovers,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和 C. Collani, P. 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方豪的《李之藻研究》和《中国天主教人物传》，王重民《徐光启》等。④作为上述三项研究的基础，学者们整理了大批书简、档案等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文献，如马爱德（Edwar J. Malatesta）等整理编辑的 *Actes du Colloque Inte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Vols. 1 - 5、杜赫德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Tome Neuvième,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Memoires dela Chine）、M. H. Reinstra, *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 1583 - 1584 和许理和等人编辑的《中国耶稣会书目》（Erik Zürcher, Nicolas Standaert & Adrianus Dudink eds.,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 - ca. 1680）、吴相湘编辑的《天主教东传文献》、罗渔的《利玛窦全集》等。

时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①被概括在“格物穷理之学”概念之下这样，“格物穷理之学”实际上就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的科学知识体。它不但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形态，而且，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形态。那么，到底何为“格物穷理之学”？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知识形态如何？它得以确立的认识论基础又是怎样的？它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及历史影响又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格物穷理之学。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格物穷理之学”这一概念由徐光启首次提出，在其后的中西会通著作中频繁出现。后来的李之藻、傅泛际、南怀仁等又用作“穷理诸学”、“穷理学”等等。这些概念之间稍有差别的，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讲道：

顾惟利先生（指利玛窦——引者）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而余亟传其小者。^②

在《泰西水法序》中，他又讲道：

^① 科学知识是指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现象和规律的经验认识它发端于对自然界的认识，然后向社会和人类思维两个领域扩展。

^② 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王重民编《徐光启集》，第 75 页。

其（指天主教学说——引者）余绪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格物穷理之中，又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用，用之无不尽巧妙者。^①

根据这两段话，当代学者大都认为，明末清初由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是一些由欧洲中世纪托马斯神哲学中的哲学部分^②翻译而来的知识。樊洪业曾对这样一种“格物穷理之学”的来由做过分析。认为：按照《西学凡》，当时西方教育有文科（修辞学）、理科（哲学）、医科（医学）、法科（法学）、教科（教规学）和道科（神学）等。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按照这六科接受教育，来华传播的也是这些内容。“根据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看，他不必把修辞学和法学的内容介绍给徐光启，教规学应与神学合并介绍。当时西方的‘哲学’是一个把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数学等都包括在内的大口袋。由此可见，徐光启‘顾惟（利）先生之学’，必然是主要看到两大类：神学和哲学。他按自己的理解把前者称为修身事天之学，把后者称为格物穷理之学。”^③按照这样一种理解，格物穷理之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会

①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编《徐光启集》，第 66 页。

② 实即亚里士多德哲学。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第 366 页。

③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第 107 页。

通中西的学说体系，而是一些外来知识的庞杂汇集

此外，钟鸣旦（N. Standaert）分析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古典科学分类观念，他采用了“格物穷理学”的说法，并将之确定为“philosophy”。张永堂将“格物穷理学”确定为哲学，认为“在内容上，包括了逻辑学、物理学及数学，而在形而上学方面则特重所以然的探究，至于修齐治平之伦理学则只是五家之一。此内容与陆王心学大异其趣，与程朱理学相较，亦极多不同。”该文也通过对南怀仁所著《穷理学》的一些分析，来阐述“格物穷理学”。但是，作者并未读过《穷理学》原书，只是根据他人介绍来加以分析，研究不够深入。葛荣晋、王重民、杜石然、孙尚扬等直接将“格物穷理之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从实学的“实体达用”（或“实理达用”）本质出发，将之纳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实学的主体内容，认为其吸收西方学术而更具特性，对后来的实学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中，王重民先生则着重强调徐光启对“象数之

学”的推崇^①

在上述七项直接讨论“格物穷理之学”概念的研究之外，徐光台、冯锦荣则以熊明遇的《格致草》为案例分析了格物穷理之学的中西会通之处。徐光台提出西方古典科学对传统格致学的影响有四个方面：一是认识由“当然之象”到“所以然之理”，再到造物主；二是以西方“格致学”（即科学）来认定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三是以西方“格致学”来补充、修正传统“格致学”；四是通过对中国经典的诠释来介绍西方格致学，引入“造物主”观念。冯锦荣认为：明代一些学者从宋明理学的“气本论”角度出发阐述“格物致知”，“利用研治西方科学的

① Nicolas Standaert,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in Jan A. M. de Meyer & Peter M. Engelfriet ed. *Lin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pp. 287–317.

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第 251 页。

杜石然：《徐光启的“主于实用”之学》，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第 710–743 页（第 724 页）。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 182 页。

王重民著，何兆武校订：《徐光启》，第 140 页。

张永堂：《明末清初西学派对“格物穷理”观念的新解释——兼论南怀仁之〈穷理学〉》，载《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第 215–287 页（第 219 页）。

机遇改造中国传统格致之学的内容”；《格致草》则是代表作。^①

对“格物穷理之学”在明末思想中的意义，何俊给予极高的评价：“徐光启真正的思想意义，在于它不仅肯定了开物成务的价值，而且在于他非常有意识地将具有开物成务这一功能的一个本来只具有工具性质的作为形而下学的科学提到与作为形而上学道德性命之学相提并论的地位。这对于中国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②它真正使宋以来的儒学发生了一个革命’^③ 樊洪业认为：在吸收利玛窦等人传入的西方学问之时，徐光启发展了程朱的“格物穷理”概念，既不是将之作为“由智达德的一个起点，而是促成了智与德的分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④ 明确指出徐光启在发展朱熹“格物穷理”认识论时将事实认知与道德反思区分开来。与此相反，李双璧却认为明末格致的含义恪守朱训，没有多少变化。^⑤

钟鸣旦对明末清初儒家学者与耶稣会士的认识论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相近之处，为双方之间的科学交流

①徐光启：《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学”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

冯锦荣：《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4期（1997），第304-328页（第308-310页）。冯锦荣认为：宋明理学讨论“格物致知”有两大派，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有三大方向，即从心学出发偏重于道德的形而上学、程朱“理本论”解释和由张载“太虚即气”观点发展而来的“气本论”解释。

②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第141页、第148页。

③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Vol. 10（1988），No. 3，第39-50页（第42页）。

④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基础。^①

杜鼎克 (Ad. Dudink) 与钟鸣旦二人对格物穷理之学原典——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穷理学》14 卷残抄本——的内容的来源与西文底本做了较多的考证。^②

上述研究反映出当代学者对格物穷理之学的共同观点：1) 保存于托马斯主义中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是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来源；2) 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格致学进行会通，形成格物穷理之学。但在会通的程度以及所形成的格物穷理之学的知识形态上却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只是从需要出发，翻译、取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部分知识，形成庞杂汇集；第二种观点认为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体，没有太大变化；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取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传统格致学内容，结合而成新的知识体。由此可见，关于格物穷理之学及其知识形态的深入研究是必需的。

格物穷理之学是中西知识会通的产物。既言知识会通，则必然涉及认识方法及相关的观念。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认识论与理学格致学说中认识论观念的关系问题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相同之处，否则，会通不能进行。谢和耐曾意识到会通的衔接点的存在，但他将之归结为智力兴趣和心理愿望。他指出这一衔接点是：“同样严肃的伦理精神、对于实用知识或实学的共同兴趣和对于恢复正统的相同愿望”。^③ 钟鸣旦则明确认

① 钟鸣旦：《“格物穷理”：17 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间的讨论》

② Ad. Dudink & N. Standaert, “Ferdinand Verbiest’s *Qiongli Xue*”

③ 谢和耐：《再论中欧最早的文化交流》。

识到中西会通存在认识论上的衔接点他因此对中西双方学者的认识论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中西双方共同持有的认识方法与认识论观念就成为格物穷理之学的认识论基础格物穷理之学的认识论基础是阐明格物穷理之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至今在此方面的研究稀少。有力度的研究仅见前述钟鸣旦的论文。

由此看来，关于格物穷理之学的研究远远不足，亟待深入。

1.3. 论文的学术意义

本论文力求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回答格物穷理之学的如下相关问题：到底何为“格物穷理之学”？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形态如何？它得以确立的认识论基础又是怎样的？它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及历史影响又当如何？从而，全面阐述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所出现的“格物穷理之学”本论文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

- 1) 分析“格物穷理之学”概念及其知识形态的演变，阐明其特征，从而澄清关于“格物穷理之学”的混乱认识。
- 2) 通过对其特征的分析，确定格物穷理之学在中国科学史、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将之确定为中国科学的前近代形态。
- 3) 阐述格物穷理之学的建设过程，从而，全面阐述 1582 - 1687 年间中西科学会通的历史过程。
- 4) 格物穷理之学认识论基础的明确，找到了理学格致学

说与西方中世纪神哲学的衔接点，在认识论的高度上发现了中西会通的依据。以往学者从功利角度来解释明末清初的西方科学在华之传播，而没有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中西双方学者推进科学知识与融合的因素。以往认为：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为改历之急需、经世致用之要求而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传教之方便，假科学为诱饵。格物穷理之学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填补了这一空白，揭示了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中土化的根源，有益于深刻认识科学与哲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5) 阐述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1.4. 研究方案

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历史资料来全面阐释 1582 - 1687 年间中西会通中出现的格物穷理之学，为此，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讨论格物穷理之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包括它的形成背景（中西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概念演变和知识形态的发展等。通过“格物穷理之学”概念及其知识形态的分析，确定它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它的学术特征，从而，确定它在中国科学史与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在格物穷理之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传统格物致知学说会通而成的新的认识原则与认识方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这些认识原则与方法的分析因此成为阐述格物穷理之学演变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上述内容的讨论是第 2、3、4 章的任务。其次，了解格物穷理之学的历史建树是深入并且具体认

识格物穷理之学的必要途径为此，论文对 1580 - 1689 年间讨论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内容的著作按年代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典型历史事件，确定格物穷理之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在这个基础上，按分期讨论格物穷理之学的历史建树这是论文第 5 章的任务最后，论文阐述了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以及它的历史影响这是第 6 章的任务。

本论文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如下：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该方法是通过数量统计得到某些结论。在本论文中通过对 1580 - 1689 年间格物穷理之学著作量按年代分布的统计，确定格物穷理之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通过比较格物穷理之学学者与其他学者在格物穷理之学与文学、艺术、形而上学等方面的成就，确定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

引证分析 (citation analysis)：该方法是通过学者间的相互引述，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关系。在本论文中用以分析参与格物穷理之学建设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联系，确定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学者。

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该方法是通过文献内容的分析来取得一定的结论。在本论文中用以通过对原始文献内容的分析，阐述“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格物穷理之学的知识形态、格物穷理之学的认识论基础和格物穷理之学的历史影响。



格物穷理之学的历史演变

2.1. 格物穷理之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格物穷理之学形成于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之中，与中西双方当时的社会和学术背景都有密切关系。

2.1.1. 中国社会与学术背景

明末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雏形，江南富庶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达到相当规模，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官僚地主对土地的疯狂掠夺与兼并，而农民生活则陷于极端贫困。明成祖以来形成的皇帝与擅权宦官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集中。农民与中小地主纷纷破产：有些流入城市，加入到手工业与商业生产行列；有些则无生路可寻，被迫起义。农民与封建地主的阶级矛盾由此激化。与此同时，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官僚地主的贪婪。明王朝经常籍借“采办”和“制造”来掠夺工商业。采办的范围非常广泛，从金银、珠宝到果品、海味、香蜡、药物，几乎无所不包；制造则掠夺当时两种主要的手工业：丝织品和瓷器。万历年后（1573—），税监更以暴力、酷刑征税，结果导致工商业户日趋贫困，无法维持生产，更不能扩大生产。市民罢市与暴动时有发生。工商业者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阶级矛盾的激化终于酿成明末白莲教、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

模的农民起义

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国内民族矛盾也日益紧张。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率满洲族反叛明王朝，攻取附近建州诸部，势力日强。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联合部分汉族地主势力建立后金政权，组建八旗军队，后改国号“清”。满清势力不断增强，迅速地向中原地区扩张。

连年的农民战争与满清入侵使腐朽的明王朝政权迅速瓦解，但同时也造成经济的严重衰退。

事实上，明末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认识，于是乎社会改革之呼声日高。其中尤以活跃于1594—1626年（万历二十二年—天启六年）的东林学派为代表。东林学派不但倡议而且积极实践社会改革。其社会改革主要针对当时的社会流弊展开。从根本上说，社会流弊由社会矛盾产生，同时在思想方面又得到王学末流之助长。

王守仁心学注重内心修养功夫，提倡通过内心的反省，发掘主体自觉性和内在的道德判断能力，认识先验的道德观念，再通过道德践履将之贯穿于社会生活之事物物之中。这就是他所谓“格物”与“致知”。格物致知仅仅是将良知扩充到底的过程。^①王守仁由此提倡“知行合一”，强调道德践履与道德认识的一致。他说：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①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第661页。

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①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本意是想通过强化内心思辨，澄清道德认识，以便实现良好的道德践履，却不料给王学末流留下了疏于读书、怠于实践的借口。王学末流注重“封域于一己意识的功夫展开”，不问世间实务，其结果是空谈心性，流于虚无。

本来明末工商业者与官僚地主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市民的自我意识随之逐渐增强，启蒙意识萌生一种强调自我价值、对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意识日盛。王学末流之“封域于一己意识的功夫展开”，正迎合了这种启蒙意识，迅速蔓延。王学末流的泛滥，一方面，推动了明末社会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另一方面，则造成学风空疏玄虚。其结果，致社稷纲常、日用法度于荒废。“在政治上，只知空谈心性，什么国计民生、典章制度一概不讲，造成‘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在经济上，鼓吹‘重义轻利’之说，以理财治生为卑俗，造成无人理财，无人治生的局面。在学术上，

①王守仁：《传习录》卷上，第7a页；《文录》，“答友人问”，第12a—12b页，第14b页。

‘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① 明末之衰败可想而知。

东林学派力求克服心学流弊的两个重要推进方向是道德践履和经世致用 在道德践履方面，东林学派抨击王学末流“封域于一己意识的功夫展开”的认识与实践方法^②，提倡不脱离事物的“实悟”与特重是非之分的“实修”，提倡传统伦理道德观念^③ 高攀龙曾讲道：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④

在经世致用方面，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反虚归实”，提倡实学，以“治国平天下”之“有用之学”为之。高攀龙曾言：

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察？明辨的确，处处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

① 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第 432 页。

② 参见 柯俊：《西学与晚明思想裂变》，第 7～20 页。

③ 参见：张岱年：《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张岱年全集》第三卷，第 386 页。

④ 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子遗书》卷九上，第 24a 页见《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第 1292 册第 551 页。